

澳門《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 之評析：修復式正義之實踐

胡中宜

壹、前言

少年心智發展未成熟，稍一不慎容易誤觸法網，完善的司法制度有助於建構安全社會，並協助犯案者更生。傳統的報復式司法制度（retributive justice）偏重於嚴懲，強調公義的彰顯等同於懲罰阻嚇，但這種制度往往忽視了讓年輕犯案者更生、學習、重建自己的機會，因此近年許多國家開始發展修復式正義或稱為復和司法制度（restorative justice），平衡犯案者及受害者的利益，鼓勵受影響者透過復和會議解決問題，使犯案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同時，向受害人表達悔意及修補傷害，減低再犯的機會（盧鐵榮、黃成榮，2009；Beck, Kropf, & Leonard, 2010；Burford & Adams, 2004；Van Ness & Strong, 2010）。此外，近代有關少年刑事哲學的思潮逐漸轉變為主張監禁並不能達到治療的效果，施以個別化、多元化的處遇，如個案諮商、家庭治療、社區組織等康復措施，可使少年重新適應社會。二十世紀開始康復哲學逐漸在

各國少年刑事司法中醞釀，許多社區處遇方案不斷被引進，而這類社區轉向的主要精神是避免少年過早進入官方的司法體系而受到犯罪紀錄的不良標籤作用，轉交社會福利機構處理，提供輔導及社工服務，能維持少年正常的在社區生活，連結社會資源以滿足需求，並要求當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此種措施的確減少司法中不必要的拘禁，研究結果顯示社區轉向處遇比機構監禁對犯罪少年矯治有較高的成功率，並且較為經濟（Clough, Kim, & Conigrave, 2008；Dembo, Wareham, Poythress, Cook, & Schmeidler, 2006；Patrick, Marsh, Bundy, Mimura, & Perkins, 2004；Van der Merwe, & Dawes, 2009）。

根據法務部（2013）最新「少年兒童犯罪概況分析」報告指出，2012年各少年法院（庭）審理終結而裁判確定觸法之少年與兒童人數合計12,045人，其中，刑事案件有392人（3.25%），保護事件有11,653人（96.75%），至於虞犯少年兒童則有2,507人。由於少年兒童仍屬身心發展未臻成熟

階段，少年事件之處理秉持「以保護替代管訓，以教養替代懲罰」的精神，兼以各界重視犯罪預防工作，已使近年來少年兒童觸法人數逐年減少，然而自 2008 年開始，少年兒童的犯罪人數逐年微幅上升，值得各界關注。

從當前趨勢分析大部分兒少犯罪屬於保護事件，此類案件多為輕微犯罪，不適合監禁處分，宜作社區處遇或非刑事性處分進行輔導措施。本文主要援引澳門《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教育監管措施的立法目的是教育少年遵守法律及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規則，使少年能以適當和負責的方式融入社群生活。文中評析制度設計與實施內涵之特色，以作為國內未來修訂少年事件處理法之參考。

貳、修復式正義之概念與意涵

近年來，刑事司法從「應報式正義」轉向「修復式正義」之思維來處理刑事司法的爭端問題。其主張「犯罪」並非是法律觀點上的定義，應從「社會」、「人際關係間的衝突」立場來看待犯罪問題，並解決犯罪問題。所以，「修復式正義」的社會關懷是強調「社會關係」的修復，當事者的權利、尊嚴應得到滿足，個人、團體與社區已損壞的關係亦得到應有的修復，即所謂加害者要復歸、被害者要復歸與社區亦要復歸（許春金，2003）。

根據 Johnstone（2002）認為修復式正義的核心價值在於使犯罪者發自內心對社會的道德歉疚，並有機會弭補其過錯，降

低再犯率；使犯罪者有機會再復歸社會重新做人；使社區有能力處理衝突事件維持平和；提升社區的凝聚與共識；避免現代刑事司法忽略與剝奪被害人權益；使受害人能受到更多尊重以及意見重視；以及治療被害人的心理情緒創傷。另外，根據修復式正義之意義和精神，許春金、陳玉書、黃蘭娛、柯雨瑞（2004）主張包括：1. 犯罪係破壞人際信賴並造成損害的行為；2. 犯罪處理的目的在修補傷害，犯罪者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並履行對被害者與社區的賠償或義務後，才能復歸社會。唯有在調解、賠償、道歉、社區服務等方式均無效的情況下，才考慮以應報、隔離、監禁等方式。而且，為了達到修補傷害的目的，鼓勵參與者表達意見，描述他們的經驗與感受、討論犯罪的影響。3. 犯罪的非正式社會控制主要在社區，處理犯罪最基本的機制是社區，而非刑事司法機構。社區有義務提供並強化支持力量，幫助終止暴力與修補傷害，將加害者蛻變成為一個負責的公民。因此，修復式正義的過程，首要的目的在促使被害者積極改變處境，恢復身心所受到的創傷，終極目標則是讓加害者、被害者、社區復歸於完好狀態。

另外，近代社會也在康復哲學與保護主義思潮的推波助瀾之下，少年司法體系開始強調社區處遇與復和司法之重要性。西方國家的作法，大都將少年犯罪類型輕微者，以保護處分及社區處遇的諮商輔導或社會福利機構為主，讓少年留在家庭，來接受社區所提供的服務，此類社區處遇

的優點能讓犯行輕微的少年回歸正常的家庭系統，增強家長責任及家庭功能，更能減低當事人過早進入司法體系所產生的標籤作用（胡中宜，2013）。

參、《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之內涵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制定《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本法律適用於在年滿十二歲尚未滿十六歲時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作出被法律定為犯罪或輕微違反的事實的少年。教育監管共有八種措施，包括：（一）警方警誡、（二）司法訓誡、（三）復和、（四）遵守行為守則、（五）社會服務令、（六）感化令、（七）入住短期宿舍、（八）收容。就同一事實對同一少年不得採用多於一項的教育監管措施。除警方警誡措施屬非司法介入的措施，其餘的教育監管措施則屬司法介入的措施。在司法介入的措施中，第（二）至（七）項所指措施為非收容性質的措施，而第（八）項所指措施為收容性質的措施。一般而言，教育監管措施的執行期限在少年年滿二十一歲前仍未完成，則該措施的執行至少少年年滿二十一歲時即須終止（澳門印務局，2014）。

決定少年適合何種教育監管措施，在具體選用第（二）至（八）項所列的教育監管措施時，法官須根據違法行為的性質及嚴重性、少年的人格、過往的行為，以及對被害人造成的損害，並考慮擬選用的措施實際上能否執行，以及少年及其父母、監

護人或實際照顧少年的實體對擬選用措施的接受程度，而選擇對每一個案最適合的措施。如少年作出多於一項被定為犯罪或輕微違反的事實，則法官按教育該少年遵守法律及使其能融入社群生活方面的具體需要，採用一項或多項教育監管措施。評估是否需要採用措施和選用何種措施時，須考慮排除或減輕不法性或罪過的事由（澳門印務局，2014）。

另外，如對涉及一個或多個程序的同一年少年採用第（二）至（八）項所指的多項教育監管措施，而法官認為各項教育監管措施實際上能同時執行，則須決定同時執行該等措施。如法官認為不能同時執行同一程序中所採用的多項教育監管措施，則法官在聽取檢察院的意見後，須以其他教育監管措施全部或部分替代原先採用的各項教育監管措施，或命令逐一執行此等教育監管措施。如對涉及不同程序的同一年少年採用多項教育監管措施，且該等教育監管措施不能同時執行，則法官須命令逐一執行該等教育監管措施。在逐一執行教育監管措施的情況下，有關的教育監管措施執行期間的總時間，不得超過所採用最嚴重的教育監管措施期間的雙倍時間。如少年在教育監管程序中被採用教育監管措施，且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被科處刑罰，則須一併履行該等措施及刑罰，只要兩者能同時執行。如少年被判處實際徒刑，且有罪判決已確定，則原先採用的教育監管措施須視乎情況而終止執行或不開始執行。即使少年被判處實際徒刑，仍可對其採用司法訓誡，以及在少年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時要

求其向被害人作出經濟上的補償（澳門印務局，2014）。

一、非司法介入

（一）警方警誡

警方警誡的性質是非司法介入，由治安警察局的專責小組在少年的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少年的實體面前，以嚴正的方式向少年指出其行為的不法性、不正確之處和指出再次作出該行為可能產生的後果，告誡其所作的行為須符合法律規範及法律價值觀，並鼓勵其以適當和負責的方式融入社群生活。

在符合下列全部條件時，方可採用警方警誡，1.少年作出被定為輕微違反的事實，或作出被定為非經告訴或自訴不得追訴的犯罪的事實，但被害人表明有意就有關犯罪作出追訴者，則不作警方警誡；2.少年在年滿十二歲後首次作出上項所指的事實；3.少年，以及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少年的實體以書面方式同意採用警誡措施（澳門印務局，2014）。

警方警誡的執行相關規定，治安警察局須指派具適當資格且已接受適當培訓的人員負責警方警誡工作。警方警誡須自查獲少年之日起三十日內作出。少年，以及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少年的實體，在警方警誡程序中的任何時刻均可委託律師。治安警察局的專責小組在作出警誡後，須按情況作出以下任一行為：1.如因應少年，以及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少年的實體在警誡過程中的表現，且經考

慮少年的犯案性質及情節、輔助需要，而認為已達到警誡的目的，且僅作警誡已足夠，則將卷宗歸檔；2.如按上項規定不應將卷宗歸檔，且少年，以及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少年的實體以書面方式同意少年參加社區支援計劃，則將個案通知社會工作局，以便該局評估少年是否需要參加社區支援計劃。如評估的結果認為少年有需要參加社區支援計劃，則社會工作局須促使少年參加為期不超過六個月的社區支援計劃，而治安警察局將程序中止；如認為無需要參加社區支援計劃，則社會工作局將此事通知治安警察局，以便其將卷宗歸檔（澳門印務局，2014）。

在作出警誡及接獲社會工作局的評估結果後，治安警察局須立即將卷宗送交檢察院，以便其在十五日內檢閱該卷宗；如檢察院認為不符合採用警方警誡的條件，須依具體情況而定，將卷宗送交法官或命令治安警察局作出更正或將卷宗歸檔。在警誡過程中或在警誡作出後五日內，少年、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少年的實體仍有權向檢察院提出異議。在完成執行社區支援計劃後，社會工作局須將案件通知治安警察局，以便其將卷宗歸檔。如少年、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少年的實體在警誡過程中反對參加社區支援計劃，則治安警察局將卷宗送交檢察院，以便其作出聲請；如上述的人在警誡過程中並未反對參加社區支援計劃，但其後卻拒絕參加或少年未能完成計劃，則社會工作局須將案件通知治安警察局，由治安警察局將卷宗送交檢察院，以便其作出司法審理聲

請。

二、司法介入

(一) 司法訓誡

司法訓誡是指法官向少年作出嚴正警告，指出其行為的不法性、不正確之處理及後果，告誡其所作的行為須符合法律規範及法律價值觀，並鼓勵其以適當和負責的方式融入社群生活。

(二) 復和措施

復和措施是指召集違法行為所涉及的人舉行復和會議，旨在協助少年不再作出不法行為，使其認識其行為的不正確之處，以及使少年能真心悔過，並取得被害人的諒解。在復和會議中應透過協商，訂出少年所須作出的下列全部或部分的行為，包括：1.向被害人道歉；2.就由其造成的財產損害，向被害人作出全部或部分經濟上的補償；3.為非營利機構進行社會性質的活動；4.遵守被認為必需的行為守則（澳門印務局，2014）。

復和措施由法官依職權決定採用，又或經社會重返部門在判決前的社會報告中或在執行其他教育監管措施期間建議而決定採用，但均須徵得被害人同意。在執行其他教育監管措施期間，如法官決定改用復和措施，則終止原先採用的教育監管措施。向被害人道歉是指少年於復和會議中在被害人面前，就其所作的行為表示歉疚。經濟上的補償可分期給付；法官根據少年的經濟能力許可分期給付和訂定有關

金額。進行社會性質的活動的期間不得超過二百四十小時，且應在一年內完成。

(三) 遵守行為守則

遵守行為守則是一項跟進和指導措施，旨在設定或強化規範少年行為的條件，使其行為符合社群生活的基本的法律規範及法律價值觀。

一般而言，可規定少年遵守行為守則，包括：1.不得前往某些場合、地方或觀看某些映演項目；2.不得與某些人為伍；3.不得加入某些團體或參加某些社團；4.不得持有某些物件；5.不得飲用含酒精的飲料、服用麻醉品或精神科物質；6.接受心理輔導和遵從為其訂定的指示。遵守行為守則的期間最短為三個月，最長為一年，由社會重返部門負責監督本措施的執行（澳門印務局，2014）。

(四) 社會服務令

社會服務令是指由法院命令少年進行有利於公共實體或非營利的私人實體的特定活動。社會服務的時數最短為二十小時，最長為二百四十小時，且應在一年內完成，由社會重返部門負責監督本措施的執行（澳門印務局，2014）。

(五) 感化令

感化令如同臺灣法院的假日生活輔導或是保護管束措施。感化令措施是指執行一項個人教育計劃，該計劃應包含法官對少年所定的、符合其需要的活動，以及法官對少年的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少年

的實體所定的義務。法官可規定受感化令約束的少年須遵守第二十一條第二款所指的特定行為守則。社會重返部門負責編製個人教育計劃，並輔助、指導和跟進少年履行該計劃。個人教育計劃須自社會重返部門獲法院通知有關決定採用感化令措施的裁判之日起六十日內送交法官認可。

法官在認可個人教育計劃前，可要求提供補充資料或要求作出更改，並命令將卷宗送交檢察院檢閱，以便該院於五日內發出意見書。社會重返部門須將對個人教育計劃所作的變更告知法官，以便其認可。社會重返部門每六個月撰寫關於少年進展的社會報告，內含個人教育計劃的執行評估，並將之送交法官。一般而言，感化令措施的期間最短為六個月，最長為三年（澳門印務局，2014）。

（六）入住短期宿舍

入住短期宿舍是指少年須在短期宿舍內留宿，日間可外出工作或學習，並於指定時間返回宿舍，由社會重返部門負責監督本措施的執行，類似臺灣的轉介安置輔導機構之處分。少年適合採用入住短期宿舍措施，包括：1.作出被定為犯罪的事實，且不適合對其採用其他措施；2.經社會重返部門跟進教育監管措施的執行，但其行為未有改善；3.在少年感化院接受收容措施，且離院時，須繼續接受輔助或跟進；4.作出被定為犯罪或輕微違反的事實及缺乏家庭支援，且不適合對其採用其他措施。入住短期宿舍的期間最短為一個月，最長為一年。法官可規定入住短期宿舍的

少年須遵守某些行為守則（澳門印務局，2014）。

（七）收容

收容是指使少年離開自由環境而留在少年感化院，該措施旨在向少年灌輸符合法律的價值觀，並使其獲得知識及技能，以便其日後能以適當和負責的方式融入社群生活。少年作出下列事實，如不適合對其採用其他措施，則須採用收容措施，包括：1.作出被定為可科處最高限度超過三年徒刑的犯罪的事實；2.再次作出被定為犯罪或可處以徒刑的輕微違反的事實。少年感化院編製個人教育計劃，並輔助、指導和跟進少年履行該計劃。個人教育計劃須自少年感化院獲法院通知有關決定採用收容措施的裁判之日起六十日內送交法官認可。少年感化院每六個月撰寫關於少年進展的社會報告，其內應評估個人教育計劃的執行情況，並將之送交法官。

一般而言，收容措施的期間最短為一年，最長為三年；但如少年作出被定為可科處最高限度超過八年徒刑的犯罪的事實，或作出多於一個被定為可科處最高限度超過五年徒刑的侵犯人身罪的事實，則收容措施的期間最短為三年，最長為五年（澳門印務局，2014）。

肆、《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之設計特色

一、實踐修復式正義的復和措施（restorative justice）

修復式正義強調「社會關係」的修復，當事人的權利、尊嚴應得到滿足，個人、團體與社區已損壞的關係亦得到應有的修復。因此制度中設計復和措施，主要程序是召集違法行為所涉及的人舉行復和會議，協助少年不再作出違法行為，使其認識其行為之不當，以及讓少年能真心悔過、並取得被害人的諒解。

復和會議由負責有關程序的法官主持；如經法官以附加理由說明的批示許可，亦可由社會重返部門的人員主持。由主持復和會議的人召集違法行為所涉及的人，包括少年，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少年之人、被害人、社會工作員，以及主持人認為適當的其他人出席會議。如復和會議由社會重返部門的人員主持，則該人員須自達成復和之日起十五日內編製「復和建議書」，並將之送交法官認可。復和會議可分多次舉行，但須自採用復和措施的裁判作出之日起三個月內結束。如復和不成或未能依期完成，則由法官依職權或經負責主持復和會議的社會重返部門的人員建議，對該裁判進行重新審查。

二、警方警誡之社區處遇模式 (community based treatment)

按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2/2007 號法律《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的規定，為教育及促使作出被法律定為犯罪或輕微違反事實的少年能以適當和負責的方式融入社群生活，有關教育監管制度除了司法管轄範圍的措施以外，還包括由治安警察局負責執行的警方警誡。在警誡的過程中，

治安警察局認為單純警誡不足以達到警方警誡的目的時，則會將個案通知社會工作局，以便對少年進行深入的評估，了解少年是否需要參加社區支援計劃。而按評估結果顯示有需要參加社區支援計劃的少年，社會工作局將聯同「社區青少年工作隊」向他們提供服務。社區支援計劃旨在透過輔導、教育或訓練活動，幫助接受警方警誡的少年改過自新，遵守法紀。同時，讓他們認識到自己所犯的過錯乃違法行為，學會自我控制，尊重他人及其財物，和面對不良同儕的引誘（澳門印務局，2014）。

服務對象主要是年滿十二歲未滿十六歲，首次作出被法律定為「犯罪」或「輕微違反」的事實，經警方警誡後同意接受社區支援計劃之少年。服務內容包括：為少年提供個別輔導，協助他們面對警誡後可能出現的情緒和處理日常生活上遇到的問題。舉行結構性的輔導小組及特別活動，協助少年處理個人需要，讓他們對事物建立新的觀點，學習新的行為模式和表達技巧，及幫助他們改善偏差行為。加強他們的家庭、同儕及社群的支持，令他們更容易融入社會。有需要時，「社區青少年工作隊」將轉介少年的家長，參與支援性的服務，學習一起幫助他們的子女（澳門社會工作局，2014）。

目前警方警誡主要由二家非營利組織辦理的社區支援計畫進行跟進輔導服務，一是「聖公會」北區青年服務隊的「同步晴 Teens」社區支援計劃，主要以外展方式為澳門北區有需要的少年提供服務。其核

心服務除外展工作外，還包括少年生涯發展、危機兒少家庭支援服務、預防濫藥服務及社區支援計劃。服務內容包括專業的個案輔導；預防、治療及發展性的小組及活動；為失學、待業、失業、身處不利環境之少年提供指導及輔導服務，協助他們面對及解決他們在個人、家庭、社群方面的問題；加強少年、家庭、學校及社區的聯繫；倡導社會關注少年的需要及問題，預防少年受不良影響（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2014）。二是「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的社區青年服務隊，由社工局於2005年委託開辦，服務對象為澳門中、南區身處不利環境的少年，透過個人、家庭輔導、小組和社區活動方式從不同的介入點去協助服務對象，並培養他們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中心設有輔導室、樂器房等設施，能開展更多元化、高質素的少年服務（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2014）。

三、當事人在少年事件審理的權益保障（right protection）

在少年參與審理程序時，須使少年個人感到自在及受最小束縛，即使在被拘留或被看管的情況下亦然。在程序的任何階段，少年尤其有權：（一）獲告知所享有的權利；（二）由司法當局依職權或在其本人要求下，聽取其陳述；（三）不回應任何實體就向其歸責的事實或就該等事實所作聲明的內容而提出的問題；（四）不回應有關其行為、性格或人格的事宜；（五）在其要求時，得到精神病學或心理學專家的輔助，以評估有否需要採用教育監管措施；

（六）提出證據及聲請措施；（七）按本法律的規定對裁判提起上訴。一般而言，在任何情況下，少年均無須宣誓（澳門印務局，2014）。

另外，程序中第四十條規定聽取少年的陳述之必要性，須由法官聽取少年的陳述；法官可指定一名社會工作人員或其他具專業資格的人陪同少年，並在有需要時，向少年提供心理輔導。

四、少年事件程序中的司法保密（privacy and confidence）

少年事件卷宗即使已歸檔，亦屬保密，不得要求查閱或取得該卷宗，亦不得取得從該卷宗內任何部分製作的副本或證明。在少年年滿二十一歲前，具有執行刑罰或保安處分職權的法官可要求取得卷宗或從該卷宗製作的證明。在少年年滿二十一歲前，任何法官亦可在下列任一情況下要求取得卷宗或從該卷宗製作的證明，包括：（一）卷宗所涉的人在年滿十六歲後，實施可科處最高限度超過三年徒刑的犯罪，或可能會延長對卷宗所涉的人所科處的實際徒刑；（二）卷宗所載資料有助於審理就少年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害而提出的賠償請求。在少年年滿二十一歲前，具正當性提起上訴的人或其訴訟代理人可查閱卷宗和取得從該卷宗製作的證明，而為撰寫社會報告或觀察少年，社會重返部門及少年感化院亦可查閱卷宗和取得從該卷宗製作的證明（澳門印務局，2014）。

若違反保密規定，將全部或部分卷宗或從該卷宗製作的全部或部分證明不正當

交予他人、供他人查閱，或透露其內容者，處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其次，使用卷宗或使用從該卷宗製作的證明的人，將之用於有別於其明確指出的用途，同樣地處上述所指的刑罰。

五、調查程序之正當性 (due process)

一般而言，少年事件立案後法院開始調查實行必需的證明措施，以便查證有關事實是否存在、評估是否有需要採用教育監管措施，以及決定採用何種教育監管措施，並且須將實行的證明措施作成書面紀錄。實行由法官主持的證明措施時，檢察院司法官須在場。調查案件，主要採取下列證明措施及證據方法：(一)聽取少年的陳述；(二)聽取少年的父母、監護人、實際照顧少年的實體或其他人的聲明及證言；(三)審查社會報告；(四)對少年進行觀察；(五)舉行調查證據的聯合會議；(六)要求任何實體提供資料和實行措施（澳門印務局，2014）。

最終法院如預計將會採用教育監管措施，須聽取少年的陳述。聽取少年陳述時，除檢察院司法官及辯護人外，僅法官認為宜在場的人方可在場。在訊問過程中，禁止在場少年的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少年的實體干預訊問。少年的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少年的實體須作聲明，但無須宣誓。如被害人及證人未滿十六歲，必須由法官向其詢問。如法官認為詢問被害人有利於對有關案件作適當裁判，則可依職權或應聲請向被害人作出詢問。凡傳召未滿十八歲的證人、被害人或參與程序的其

他人，必須同時傳召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該未成年人的實體。如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該未成年人的人無合理理由不到場，則法官須判處未到場者繳付澳門幣七百五十元至四千元的款項。

第五十七條規定另外得召開調查證據的聯合會議，法官可在程序中的任何階段決定召開調查證據的聯合會議，以便在保障辯論權下，調查所發現的跡象，以及查明有關少年的人格、行為的情況，並了解其社會、家庭的背景及經濟、教育的狀況。在調查證據的聯合會議中，少年，以及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少年的實體必須在場；如有委託或指定的辯護人，則該辯護人亦必須在場。如為調查證據所需，法官須命令被害人或他人，尤其是社會工作人員出席調查證據的聯合會議。

第六十一條規定聽證程序，如法官認為有充分跡象顯示少年曾作出批示、聲請書或檢舉文件載有的事實，且基於當時教育少年的需要，認為可能會對其採用收容措施，則法官須指定聽證日期，並通知一名社會工作人員參與聽證。另外，程序上須傳喚少年，其父母、監護人、實際照顧少年的實體，或是辯護人及法官認為宜在場的其他人出席聽證。為維護當事人的尊嚴或確保聽證工作的秩序和規則，法官可依職權或應聲請，以附加理由說明的批示，包括：1.限制公眾在場旁聽，或決定僅獲其明示許可的人方可在場旁聽；2.命令傳媒不可描述或複述有可能透露少年身分的資料、行為或事實。經法官許可，社會工作人員可詢問少年及其他被傳召出席聽證的

人（澳門印務局，2014）。

伍、對臺灣違法少年輔導工作的反思

基於上述澳門《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的內涵介紹與特色評析，作為國內未來少年犯罪輔導之參考。

一、修復式正義在違法少年輔導之應用

目前，修復式正義的主要措施包括「家庭團體會議」、「社區會議」及「受害人與被害人調解會議」等類型（黃成榮、莫偉賢、歐陽芷柔，2012）。對於因一時衝動而犯罪，事後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後悔，希望對被害人作出補償的少年，教育監管制度中制定了復和措施。首先，犯罪後須承擔法律責任和面對後果，違法少年不了解其錯誤，光是處罰對其並非最好的教育方式；再者，少年在犯罪後心理的後悔和愧疚，若得到被害人的原諒，對於違法少年未來的成長亦能發揮正向作用。復和措施即是在徵得被害人的同意下，召集違法行為所涉及的人（包括違法少年、其父母及被害人等）舉行復和會議，協助違法少年認識有關行為與後果，使其真心悔過，並取得被害人的原諒，不再作出違法行為。

復和措施的正向效果也在其他地區獲得支持，例如胡中宜（2013）指出香港循道衛理中心於 2007 年曾向接受警司警誡的少年進行一項問卷調查，結果發現近七成受訪者願意參與調解服務，他們希望可

以向受害人道歉或作出補償，了解自己行為對他人的影響，從以減低重犯的機會，並與人建立和諧關係；有鑑於此，機構於 2007 年創辦了「康和服務」，內容是提供專業調解及相關支援服務給曾犯罪的少年、受害人及雙方的家人、支持者；另透過中心專業調解員作橋樑，協助少年及受害者雙方之衝突得以直接紓解。

二、連結社區資源與跨專業合作

對於微罪初犯的少年，非司法介入是較佳的處遇措施，可避免司法標籤的效應，教育監管制度即有如此的設計。警方警誡是透過社會工作局委託民間非營利組織辦理的社區支援計畫進行跟進服務，過去香港也有同樣的經驗，早期警方警誡計畫是由警方獨立辦理，但礙於警務人員的任務定位、專業知能與訓練不足，1994 年後改由民間社工機構承接，到現在「社區支援計劃」仍由警方委託非營利組織承接，目的是借重非營利組織的非司法、福利色彩，以及豐富的多元專業與社區資源，進行少年犯罪輔導的工作（胡中宜，2005）。因此，當少年被轉向至社區後，民間機構發動社區之力量，連結專業輔導、志工與社區資源，共同協助少年及家庭進行康復，透過結合警察、社會福利、教育、衛生等資源，建構一個多元專業的輔導團隊，達到事半功倍且滿足各種多元心理社會需求的目標。

三、家長參與犯罪輔導工作之重要性

警方警誡後續的社區支援計畫強調少

年與家長積極參與對控制再犯的關鍵作用，值得思考。胡中宜（2008）以美國加州長堤社區司法轉向處遇進行的個案研究為例，建議組成「家庭小組會議」或「調解會議」的形式，在犯罪轉向時便與父母見面，一起討論被確認的問題，並簽訂輔導契約。換言之，在協調過程強調家人的參與，以致能整體了解違法少年及其家庭的需要，為其提供適當的支援，並讓該家庭積極參與會議內所訂立的康復計畫內容。

四、少年事件處理的正當程序與權益保障

在澳門教育監管制度中有許多少年當事人權益保障的設計，強調正當程序的進行，包括告知同意權、聽取陳述、緘默權、提出證據與聲請、上訴權、司法保密、社工陪同等措施。換言之，少年法的精神既在保護與管教，以福利與教育本位來處理少年的犯案事件，於是法官與警方就賦予較大的裁量權，但是為保障人權，法律正當程序亦應適用於少年案件。因此，檢視我國少年司法的設計與實施中的正當程序

與當事人權益之保障措施，是未來須重視的議題。

陸、結語

綜合考察澳門《違法青少年的教育監管制度》，可以發現制度設計中存在幾項特色，包括：修復式正義的復和措施、非司法的警方警誡、程序正當性、家長參與、資源合作，以及結合多元的教育福利處遇。這樣的設計概念，除了傳統司法處分外，亦提供更多司法檢控以外的選擇，避免讓違法少年過早進入刑事司法程序，加強違規少年及其家庭的參與，並對他們提供足夠的支援，對其行為負責及作出補償，降低再犯機會，以符合修復式正義的核心概念，即個人與社區共同復歸的精神，希冀透過教育監管制度的評介能對於我國少年司法政策提供借鏡。

（本文作者胡中宜現任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少年犯罪、教育監管制度、修復式正義、青少年社會工作

參考文獻

- 法務部（2013）。101年少年兒童犯罪概況及其分析。臺北：法務部。
- 胡中宜（2005）。少年犯罪轉向計畫之比較研究：以美、德、港、臺四地為例。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5，1-36。
- 胡中宜（2008）。微罪少年社區轉向之實施策略：一個長堤社區方案的考察分析。犯罪學期刊，11(1)，145-177。
- 胡中宜（2013）。青少年犯罪司法轉向計畫之實踐與反思：以香港火鳳凰計畫為例。警學

- 叢刊，43(5)，31-49。
- 許春金（2003）。修復式正義的實踐理念與途徑：參與式刑事司法。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1，37-66。
- 許春金、陳玉書、黃蘭娛、柯雨瑞（2004）。警察機關在修復式正義理論中角色扮演之研究。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委託研究報告。
- 黃成榮、莫偉賢、歐陽芷柔（2012）。修復式正義在香港和大陸青少年司法範疇之應用。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19，73-103。
- 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2014）。「同步睛 Teens」社區支援計劃。網頁
http://www.skhsco.org.mo/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Itemid=14&lang=zh
- 澳門印務局（2014）。澳門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網頁
http://bo.io.gov.mo/bo/i/2007/16/lei02_cn.asp
- 澳門社會工作局（2014）。社區支援計畫。網頁
http://www.ias.gov.mo/services/service_young.jsp#tabs-5
-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2014）。社區青年服務隊。網頁
<http://news.ugamm.org.mo/CN/?action-viewnews-itemid-3699>
- 盧鐵榮、黃成榮（2009）。香港的復和司法：在少年司法制度中的應用、發展與限制。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Beck, E., Kropf, N. P., & Leonard, P. B. (2010). *Social work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Skills for dialogue, peacemaking, and reconcili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rford, G., & Adams, P. (2004). Restorative justice, responsive regulation and social work.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elfare*, 31(1), 7-26.
- Clough, A. R., Kim, K., & Conigrave, K. M. (2008). Promising performance of a juvenile justice diversion programme in remote aboriginal communities, Northern Territory, Australia. *Drug & Alcohol Review*, 27(4), 433-438.
- Dembo, R., Wareham, J., Poythress, N., Cook, B., & Schmeidler, J. (2006). The correlates and consequences of drug involvement among youths entering a juvenile justice diversion program. *Journal of Child & Adolescent Substance Abuse*, 15(4), 1-36.
- Johnstone, G. (2002). *Restorative justice: Ideas, values and debates*. Devon, UK: Willan Publishing.
- Patrick, S., Marsh, R., Bundy, W., Mimura, S., & Perkins, T. (2004). Control group study of juvenile diversion programs: An experiment in juvenile diversion--the comparison of three methods and a control group.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1(1), 129-135.

- Van der Merwe, A., & Dawes, A. (2009). Toward good practice for diversion: The development of minimum standards in the South African child justice system. *Journal of Offender Rehabilitation*, 48(7), 571-588.
- Van Ness, D. W., & Strong, K. H. (2010). *Restoring justice: An introduction to restorative justice*. New Providence, NJ: Lexis Nexis.